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書評論文

羅爾綱考訂《水滸傳原本》

孫述宇

國立成功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簡介

羅爾綱先生考訂的《水滸傳原本》由貴州人民出版社刊行，書中《前言》署1988年8月，書末出版資料頁說第一版第一次印刷於1989年10月，事實上面世的日子可能更遲一年半載。這本書很值得注意，因為羅先生是中國近代史的泰斗、太平天國史的最高權威，對秘密會黨的組織與發展極有研究，而《水滸》與《三國》系統的俗文學與民間武裝關係極為密切。羅先生在《前言》中說他注意《水滸》的問題已有六十年，而這本書是他最近七年系列專心研究的結晶，我們當然應該十分重視。

羅先生的《水滸傳原本》有《前言》十二頁，《水滸傳考證》近百頁，其後便是考證出來的《水滸傳》原本七十回。在《前言》和《考證》中，他首先直截了當說出結論：《水滸傳》原本只有七十回，是羅貫中在元末明初所撰，主旨是歌頌農民起義；郭勛百回本出現在明中葉，其中七十（或七十一）回¹後的部分乃是一個對明太祖誅戮功臣之事心存悲憤的人續成，這個「續加者」對前七十回也作了許多修改。

這些結論如何得來呢？在《考證》部分的第一章，羅先生指出《水滸》一名來自《詩經·大雅》詩句「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他認為這首詩講述的是周的太王帶領民衆越過江河到岐山建國，《水滸傳》的主旨應當與此相類，作者的意圖應當是說宋江弟兄領導農民起義建立新政權。在第二章羅先生討論作者問題，他摒除了施耐庵的可能性，把作者肯定為羅貫中，而根據賈仲明《續錄鬼簿》等資料去確認羅貫中是元末明初人，《水滸傳》寫於明初；又因羅貫中曾參加元末的武裝叛亂，更認定他寫的那本《水滸》必是反封建宣揚農民起義的。在第三章他繼續討論著作問題，指出明太祖屢次誅戮功臣，成祖的

1 羅先生的《水滸傳原本》把百回本的第一回算作《引首》，第二回作第一回，於是百回本的七十一回便是《原本》的第七十回。本文若無特別說明，一般是依鄭振鐸、王利器、吳曉鈴的匯校本《水滸全傳》（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4年）。

文字獄也很可怕，百回本的後卅回寫梁山好漢的淒慘下場，是對太祖譴責之意，而寫作時間當是在成祖後，大概就在郭勛百回本中首次出現。可是怎麼知道羅貫中的原本是七十回呢？羅先生在第四章裏說，無論用文學水準的優劣作標準，或用站在農民起義抑或封建統治立場作標準，都可判斷前七十回與後卅回是不同的著作。然而前七十回不是也有許多忠君愛國的言語和行動嗎？羅先生認為這些都是後卅回續加者盜改所致，並在第五與第七兩章加以討論。他在第六章討論後卅回為後人續加的證據，如《引首》和智真長老的偈語等。第八章用明人王圻和徐復祚的話來證明羅貫中的《水滸》原沒有百回，因為王說《水滸》像《西廂》一樣以「驚夢」結束，徐說「征遼、征臘，後人增入」。在第九章，羅先生拿古本《三遂平妖傳》與《水滸傳》對勘，發現贊詞相同或相近似的有十三處，敘事相似的有三處，對貧民的態度相類的也有兩三處，認為這顯示兩書都是羅貫中所著；由於贊詞十三篇都出現在前七十回，又足證只有這部分是羅貫中的原著，餘為後人所加。

得到這些結論後，羅先生進而尋求恢復羅貫中《水滸傳》原本。他的方法是拿百回本和袁無涯的一百廿回刻本來對勘。袁無涯在他的《全書發凡》裏說：「舊本去詩詞之煩蕪，……茲復為增定，或竄原本而進所有，或逆古意而去所無。」羅先生認為，這表示袁無涯是比對著羅貫中的原本和百回本，把續加者在百回本所刪除掉的一些原本中的文詞復原，因此，袁無涯的刻本會比較百回本保留更多羅貫中原本的本來面目。這個假定，羅先生在把百回本和袁無涯本對勘之後，覺得是獲得證實了。理由有二：一是這兩個版本在宋江殺惜的敘述上相異甚大，而袁無涯本優越，羅先生認為這足以證明百回本的續加者把原本竄亂；另一個大概算是更重要的理由，是羅先生認為兩個版本相異的詩詞和文字，在在都顯示袁無涯本更符合羅貫中的反封建精神和優美的文學風格。

羅先生就從這裏出發，去做羅貫中原著的恢復工作，考訂出《水滸傳原本》。他用百回本《忠義水滸全傳》（人民文學出版社1975年排印的容與堂本）的前七十一回為審訂對象，用袁無涯的百廿回本《忠義水滸全傳》（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排印）來對勘。重大的更改有幾項，包括《引首》、「宋江殺惜」的兩回，以及前前後後許多詩詞。但在百回本和袁無涯本的詩詞相異之處，有時他發覺百回本所有的反而比袁本的更反封建，於是就「根據羅貫中清新俊逸的風格，和熱烈歌頌農民起義的思想來鑑定」以作取捨——這大概是他不乾脆拿袁無涯本作底本的重要原因吧。此外，他對百回本內他認為是續加者盜加和盜改的零星文句，都只注出，而不加刪改；但對書中許多「忠義堂」和「忠義」的字眼，他就大刀闊斧地刪去。

這本《水滸傳原本》，羅先生想必亦同意，只是恢復羅貫中原著的第一步而已，因為羅先生也認為袁無涯本只是保存原著的面貌較多，究竟並非原著，拿它與百回本來對勘自不可能把原著完全恢復。例如羅先生相信原著以「驚夢」作結束，這夢又不是百回本末尾宋徽宗的夢，但袁本和百回本都無別夢，金聖歎那個嵇叔夜夢當然也不能用，那麼這夢到哪裏去找尋呢？於是《水滸傳原本》只得從缺。羅先生很謙遜，在《前言》結束時說自己是「抱著

戰戰兢兢的心情」來做這件「無前人範例可循的嘗試性質的工作」，並竭誠請讀者提出意見，以求羣策羣力把這工作完成。

我在下面就應羅先生的號召，謹提出一些問題來討論一下。

《水滸》的內容與其創作時代

《水滸傳》所述宋江弟兄的故事，在歷史上如何演化，至今還不清楚，原因當然是足可佐證的文字紀錄太少。從宋代的「說話」資料，加上《宣和遺事》和龔開的《三十六人象贊》，我們應該相信宋江一伙的故事在南宋時已在流傳；而余嘉錫在《宋江卅六人考實》所提出的南宋史料，讓我們更可相信這組英雄故事與宋金戰爭大有關係，而故事的創作應當開始得很早，早到宋金戰爭第一代的記憶尚未遺忘的時候。到了元代，雜劇舞臺也上演梁山泊戲曲。若把現存的元雜劇拿來與《遺事》、《龔贊》等一比較，我們就會看到宋江弟兄故事在承傳演變和地區性分歧各方面都有問題：《龔贊》中的故事是以太行山為中心的，梁山泊一回也沒提到；但元雜劇中的故事卻只道梁山泊，不提太行山。《龔贊》中晁蓋沒有早死，也沒有首領地位；《宣和遺事》提及他死了；元雜劇差不多都不忘說一下他已死去，但並非死在曾頭市，而是在祝家莊。直至本世紀，中國各地區仍有不同的水滸故事；比如說，有些地方戲演武松獨臂擒方臘，儘管數百年來《水滸傳》講方臘是魯智深擒的。這種地區性的分歧也許是水滸文學從開頭就有的現象。元末明初寫成的小說《水滸傳》，是不是繼承元雜劇的水滸傳統呢——它們的聚義中心同是梁山泊？這似乎還不易斷言，因為元雜劇中的水滸故事很粗樸，而且除了在《水滸傳》大聚義後的一兩回中胡亂出現之外，並不被吸入小說裏。另一方面，《宣和遺事》裏的生辰綱和玄女娘娘等故事，都是《水滸傳》中的要項。花和尚魯智深是小說要角，但他是個關西人，出身抗金大將種師道麾下，藏身抗金僧兵的重鎮五臺山：他會不會是個太行山系統或更西去的系統所創造的人物而被吸納入梁山系統中？地理上的錯誤會令人起疑：花和尚從山西五臺到河南開封的大相國寺去，途中怎麼到了青州(山東)管轄的桃花山劉太公莊上扮新娘打強盜？為了賺宿太尉進香的儀仗，宋江大伙從梁山出動，可是宿太尉是在華山進香，與梁山足足隔了一整個中原：宋江從太行山或華西某地的聚義廳出發會不會合理些？

一本近似今日面目的小說《水滸傳》是甚麼時代才出現的？這個問題同樣缺乏文獻資料來作答。現在版本中最早出現的是百回本《忠義水滸傳》(郭勛一天都外臣一容與堂)，它的內容有衆英雄上梁山聚義、招安、征遼和征方臘大結局四大部分。稍後出的一百廿回《忠義水滸全傳》，除了有那四大部分之外，還有平田虎和平王慶兩部分。這些內容創作有怎樣的先後次序呢？衆英雄上梁山聚義的部分當是最早的吧，但其他部分的創作不會與它同時而必定比它晚嗎？征方臘和大結局也較梁山聚義晚出嗎？理由何在？不少人以為征遼可能創作於征方臘之後，原因是那些天罡地煞只犧牲在征臘之時，沒有人在征遼之役戰死。

但這是充分理由嗎？「全師而旋」的征遼構想是不可能一開頭就有的嗎？田王兩部分是百回本面世後才有的後期創作嗎？抑亦有所本？宋江弟兄故事中有許多母題(motif)會重複出現，比如「好漢遭陷害」便是一個，這母題重複出現使這套英雄故事帶上一層迫害感和怨艾自憐的色彩。值得注意的是，這個遭陷害的好漢往往或多或少與民間文學中岳飛的形象相似。他除了武藝過人品性純良(如林冲是八十萬禁軍教頭)外，人又精忠為國，既安內又攘外(岳飛除了抗金又曾平軍賊曹成、張用和洞庭寇楊么；宋江既平遼又平臘，在平王慶時也有民衆問他是不是「那殺韃子平田虎不擾民的宋先鋒」)，而他的罪名卻是謀反(大結局如此，宋江在江州和青州亦如此，盧俊義在大名亦如此)，還寫反詩(宋在江州和盧在大名都有反詩；《三朝北盟會編》所錄佚名撰《岳侯傳》提到岳飛在獄中被問及「寒門何載富貴」之句，還有他「自比藝祖」等罪狀)。他的敵人常是女真人(曾頭市的族人是人，征遼時所遇的兀顏家族當然是影射金的王族完顏氏；而宗霖、宗雲、宗電、宗雷這些皇室兄弟雖然姓遼室的耶律，排行的宗字卻顯然來自金太子宗望、宗弼等)，或者是有幾個兇猛的儿子(曾頭市和祝家莊都如此，征遼時亦有；而金將中正好有幾個有名的太子，如陷汴京的幹離不是二太子，後來的兀朮是四太子)，有個勇猛的李姓虎狼(《金史》中有傳的李成常與岳飛對敵；小說中大名府梁中書手下大將就叫李成，遼國又有金吾李集是著名漢奸李陵之後)，而陷害他的奸人又很像秦檜，本身是文官或幕僚，姓名或有「高」字(高俅和劉高；檜是很高大的樹，秦檜在太學裏有混名「長腳」)，妻子很會害人(如劉高妻就像秦檜的王氏)，卻有個很良善而與他大異的兄弟(秦檜有兄徽之，王文炳有兄王佛兒。王文炳叫做「文炳」可能因為秦檜早年寫了些主戰的文章，甚有清譽)。這些母題重現的情形，顯示許多《水滸》故事都不是明朝才開始創作的，甚至不是元朝，因為元明時的人對金的入侵、宋的軟弱、岳飛的死和秦檜的奸已不會那麼耿耿於懷，而且如果心中有甚麼悲憤也不妨明言直說，不必隱隱約約地影射。那麼，明代小說《水滸傳》的出現大概是個編纂修訂的問題多於是個創作的問題。甚至那個從上山聚義到安內攘外到冤死結局的太致結構，都很可能是宋金之時便已有的。²

現在羅爾綱先生提出說，明初羅貫中創作的《水滸傳》原本，約莫就是百回本的頭七十回，結束於大聚義後的一個噩夢。這個說法與清初金聖歎之說基本上相同。金聖歎宣稱他的貫華堂本就是未經「狗尾續貂」的「古本」，但從胡適和鄭振鐸下來的現代學者都不相信他的話，而相信他只不過把百回本「腰斬」而泡製出貫華堂七十回本。學者相信他作偽的原因

2 可參看拙著《水滸傳的來歷與藝術》(香港：明報出版部，1984年)中第一部分。

是他不喜歡看見梁山的強盜後來為國為民做「忠義」的事。羅先生的立場當然和金聖歎不同，然而他心目中的《水滸傳》原本與貫華堂本的長短相同，而他得此結論的理由與金聖歎的理由也很相近。兩位都認為前七十回比後面的章回在文詞和藝術上優勝得多，在思想上也截然不同。

我們且先把這兩點理由分析一下。

《水滸傳》前後部分的藝術與思想

先說藝術水準。我們若把百回或百廿回的《水滸》從頭讀到尾，都會覺得後面的章回一般不如前面的精采，人物沒有那麼活潑，真實生活的感覺也沒有那麼強烈。可是前後的分野在哪一回？這是很要緊的一點。而藝術水準有異，是否便足以證明有不同的手筆，也有疑問。

給讀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場面，聚集得最濃密的部分其實是前四十多五十回，並不是七十或七十一回。這四五十回有別於後面的章回，講的是少數好漢個別在江湖上的際遇。頭廿回依次講述史進、魯智深、林冲和楊志，一個引出另一個，楊志的生辰綱引出晁蓋等七人上梁山；接著是宋江的故事，他與多位好漢一一遇合，其中武松獨佔了有名的「武十回」的許多篇幅；宋江上山已是四十二回，等到講講李逵還鄉，而楊雄、石秀引致梁山與祝家莊衝突，小說就進入另一階段，講集體行動為主的故事。集體行動並不如開頭那些個人故事吸引人。三打祝家莊夾著解珍、解寶、孫立、孫新和顧大嫂的故事，高唐州之役帶著柴進、李逵、羅真人和公孫勝的故事，大名府之役又有燕青救主和盧俊義落草的故事，因此都有可讀之處；但真正攻打祝家莊、曾頭市、大名府的戰爭經過，或者呼延灼和關勝等將領來征剿梁山，或者最後梁山好漢和董平、張清的戰陣，就說不上如何精采。我們能說這些戰陣的敘述，肯定比征遼或平方臘的戰陣寫得好嗎？另一方面，在七十回之後便沒有精采之處嗎？在眾英雄的結局——除了戰死，還有出家的、坐化的、歸隱的、鳩死的和為義氣而自縊的——難道沒有前面的藝術水準？

金聖歎以文筆優劣為尺度衡量，把分界劃在第七十一回大聚義處，是欺人而已。他的貫華堂本更把這七十一回都好好潤色了一番，後人由是更易受他的騙。羅先生《考證》的第四章(頁21)提到清人程穆衡和近人錢靜方都同意說《水滸傳》在七十回後是「狗尾續貂」，前後的筆墨優劣「判若天壤」；這兩人都可能讀了貫華堂本，未加細察就以七十一回做分界。

一本作品的各部分有高下優劣，未必表示有不同的作者，事實上同一人也會寫出水準不同的東西。不同水準的表現令讀者起疑，這是很自然的，但讀者決不應一起疑心就下結論。舊小說中，《紅樓夢》有這個問題；其實《金瓶梅》在西門慶死後的章回也覺不如前有氣力，但這很可能是那位不知名的作者心情變了或境遇變了，又或是潤色改良到西門之死便停了手。即使《紅樓》，又會不會只是修改到八十回，而不是只寫到八十回？無論為何，

《水滸傳》中的田王部分比較像另有來源，百回本《忠義水滸傳》則極可能是一人之作，因為它有個單一的構想，那就是忠良之人得不到好處，整個小說的發展固然有這樣的主題 (theme)，在前面衆英雄一一落草時我們也看見這個反映民間心目中岳飛生平與命運的母題一再出現。

其次說思想。倘若一本作品前後兩部分有截然不同的思想，那倒是有兩個作者的好證明；但《水滸》的七十回前後有截然不同的思想嗎？從前金聖歎說有，他說前七十回寫強盜，七十回後卻寫忠良；他因此把書在七十回處切斷。但我們知道，他不得不修改前面不少的文字以圓其說；尤其對爲首的宋江，學者發現金聖歎花了許多筆墨來把他變成一個奸詐小人。現在羅先生有一系列假定，首先是《水滸》原本的作者是羅貫中，其次是羅貫中參加過元末民間武裝起義，其三是羅貫中在《水滸》中採取歌頌農民起義、反對封建壓迫的態度。羅先生覺得《水滸》前七十回的政治態度正是這樣的，而七十回後就變成擁護封建皇朝統治。前七十回中許多忠君愛國和不肯落草的話，羅先生肯定都是那個續加者杜撰的。

但是羅先生的一串假定難免引起些疑慮。我們不妨相信那個「有志圖王」的羅貫中就是把宋江弟兄故事編寫成《水滸傳》的人，不過有這樣人生經歷的人是否必會歌頌民衆舉事和反對傳統政治社會結構，卻是個大疑問。羅貫中果真參與過元末的動亂，他會很清楚，那時並起的羣雄張士誠、陳友諒等等，無不與朱元璋一樣要做皇帝，與從前秦末的草莽英雄劉邦、項羽、彭越、英布等的情形無別(《水滸》中李逵一再擁宋江爲帝，倒是很能反映這種「農民革命」的真實)。民衆領袖既然都想建立皇朝，怎能同時歌頌他們而反封建？況且，羣雄互相攻戰，該選哪一位來歌頌？階級出身也不能作爲選擇的標準，因爲許多位的出身都無分別。下層出身並不能保證會做個較好的統治者；典型下層出身的漢高祖和明太祖，反不如典型軍閥唐太宗和宋太祖。西漢末年的大混亂中冒出的光武帝，是中國歷史上最好的皇帝之一，那時的赤眉銅馬及其他民間武裝所擁立的皇帝如果成功大概也不能及，但他卻獨有皇族血統。羅貫中既寫歷史小說，對這些史料必然熟悉，加上親身經驗，他當不會採一個近似中國共產黨的讚美農民革命而又反封建的立場。事實上，他的另外兩本作品《三國演義》和《三遂平妖傳》，都絲毫沒有反封建和謳歌人民起義的色彩。

羅先生指出《水滸傳》前前後後有許多同情民間疾苦的言語和詩詞，第七十一回排座次之後又有一篇四六文歌詠衆好漢大聚義，這四六文在百廿回本中有「八方共域，異姓一家……都一般兒兄弟稱呼，不分貴賤」等字句。這些是不爭的事實，但恐怕亦未足證明羅貫中有人民革命和建立平等新社會的理想。同情民間疾苦是很普通的態度，通俗文學的對象既是一般老百姓，自然更會表現這種態度。「民爲貴」，「不患貧而患不均」，「四海之內皆兄弟」等觀念都是中國舊傳統所有的，只不過未必是最主導的觀念；同情民間疾苦與維持傳統社會秩序，並沒有太大的矛盾。這大概就是編寫《三國》、《平妖》和《水滸》的羅貫中所採的立場和態度。梁山好漢是一個武裝起事的團體，但決不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組織，因爲梁山好漢中出身農民、獵戶、漁夫、工匠、甚至地痞流氓的數目，遠不如大小地主、官吏

和兵將。梁山的先後兩首領晁蓋和宋江，一是地主，一是地主家庭出身的官吏；後來多一個副領袖盧俊義，是個富戶員外；另一個與宋江一樣最爲江湖好漢敬重的人物柴進，便是排座次後那篇四六文所說的「帝子神孫」，因爲他是前朝周世宗的子孫。阮氏三雄、時遷、劉唐和李逵等都是寫得很生動的人物，也在故事中扮演重要角色，可是他們的地位——在讀者聽衆心目中以及在小說情節發展中的地位——是決不能與上述四領袖相比的。

《水滸傳》中那些模糊的平等觀念和四海一家思想，會不會只是民間武裝和地下組織的特色？從南宋、金、元下來，大河上下和大江南北斷斷續續的民間武裝活動也許並沒有完全停息過，地下組織也沒有完全被消滅或解散，而是有時活躍有時沈寂地延續著。宋江弟兄與劉關張等故事流傳其間，用結義的觀念來滿足平等的渴望並組織團體，又用不近女色來鞏固隊伍。初民和古代的社會似乎曾有比較平等的原樸組織，但帝皇和封建制度產生之後，在東西方社會裏一直盤據著，統治者儘管有所替換，統治方式卻不見替換；新的統治方式要到十八世紀美國和法國革命才開始實驗。《水滸傳》中的人物和這本書的明清讀者與聽衆，大抵都沒有想到從梁山開始去建立一種新的平等政治制度，他們心中的選擇只是宋江爲帝或者大伙歸順宋廷，如此而已。但那朦朧的平等社會和四海一家的念頭，卻似乎是民間武裝和秘密會社常有的。在這複雜的問題上，羅先生是權威學者。他對中國歷史上會黨的廣博研究一定有無數資料可供參考，我不敢班門弄斧多說下去。

其他證據

除了認爲前七十回與七十回後部分在藝術與思想上都有別之外，羅先生在《考證》中又提出種種證據以證《水滸》有續作之事。《考證》的六、七兩章講的是小說中的證據，八、九兩章講的是小說之外的證據。這些內外證據有時仍有可以商榷的餘地，但大致都很有道理，有些且具有很强的說服力。

第六章提出的第一項證據是《引首》的一首詩，羅先生認爲詩既在《引首》，理應涵蓋全書內容；而詩句只說到大聚義（「水滸寨中屯節俠，梁山泊內聚英雄」），不及征遼征臘，可見小說的原本是只到七十回大聚義爲止。這樣推論當然很有道理，可是換一個角度來看，這詩是插在洪太尉誤走魔星故事中，因此詩句的主旨也有可能只在於點出一百八人日後之所以會聚衆叛亂，實在是由於他們本是魔君，而不必涵蓋他們全部的行爲。羣魔再後歸正，是玄女娘娘教誨的結果，這是《水滸傳》中的大事，而且早已出現在《大宋宣和遺事》中，所以受招安和盡忠報國的結果可以是原有的。

第二項內證是智真長老預言魯智深一生的偈語。在第五回，智真說的是：「遇林而起，遇山而富，遇水而興，遇江而止。」羅先生認爲句中的林是林沖，山是二龍山，水是梁山泊，江是宋江；他由是判斷這預示魯智深的故事到上梁山跟隨宋江就完結了，後來擒方臘和聽潮圓寂等等都是續加的，第九十回的智真偈語亦然。羅先生的話言之成理，只是

智真的偈十分空靈，很難確定所指。若說偈語指出魯智深會成為山上綠林，後來卻在江河地區活動，並在那裏結束生命，不也很合理嗎？若然，那麼他參與征剿水鄉澤國中的方臘，也在預言之中，而與第二偈的預言吻合。無論如何「遇江而止」那一句萬不好說是只能指與宋江相遇，而不能指聽到錢塘江潮音而圓寂的結局。

第三、四項內證分別是地理和歷史問題。在第三項，羅先生指出薊州是《水滸傳》前部的重要活動地區，因為公孫勝和羅真人還有石秀和楊雄都在這地區，後來征遼時卻因為地屬遼境而成了戰場。羅先生疑心羅貫中寫這小說時心中一定並無征遼的構想，所以才把許多好漢的活動安排在薊州。羅先生很有理由生疑，只是《水滸傳》的地理問題很多，不知是否適宜據以下這樣的結論。本文前面也提出魯智深故事和五十九回「宋江鬧西嶽華山」的故事，這種荒唐的錯誤，也許都只表示宋江弟兄故事有不同的起源而已，我們總不好說魯智深或鬧西嶽故事是續書人加插的。像薊州的一些故事，似乎亦可作如是觀。楊雄、石秀或公孫勝師徒的故事很可能是河北地區創始或修訂過來的，這過程在金或元的時候完成，那麼，薊州在宣政年間不屬於宋而屬於遼的事實也就會被忽略過。在第四項，羅先生指出九十回（即匯校本一百十回）李逵、燕青聽到關公刮骨療毒的故事，由於這裏的故事在情節與語氣都與《三國志通俗演義》相同，而《演義》要到明中葉十五、六世紀之交才問世，這表示《水滸傳》後部這種故事是羅貫中成書百年後續加的。羅先生的推論當然是持之有故，但仍有一點兒可以商榷的餘地，因為刮骨療毒的故事早見諸《三國志》，它出現在九十回並不能表示這一回的遲早。³至於情節、語氣或文詞的雷同，恐怕亦無太大的意義，因為明中葉出現的百回本當然可能把《演義》的一段精采文字抄來插入。我們都知道《金瓶梅》有整段的牀第描寫來自當時的色情小說，顯然由於書賈覺得這樣可以增加銷路。《水滸傳》中夾了一段《三國演義》，當亦可如此了解。

第七章的標題是「續加者盜改羅貫中《水滸傳》原本的證據」，但羅先生在這裏只是說他認為在前七十回中的一些故事情節和字句一定也會被後來的續加者作過「割裂刪削」和「改動」；換言之，羅先生是作了一些推測。這些推測——如說《引首》一定經過割裂，《驚夢》刪去了，九天玄女等故事改動過——都很有趣，但本身不是證據，我們在此也暫時不視之為證據來討論。

3 《三國志》的《關羽傳》只說到醫生為他刮骨療毒，沒有說醫生是誰。《三國演義》和《水滸傳》都說醫生是華佗；但華佗之進入刮骨療毒故事是否始於《三國演義》固未能確定，即使確定，也不能充分證明這部分的《水滸傳》創作得晚，因為版本資料有種種問題，而下文提到的書賈抄襲的可能使我們更難推論。

第八章載兩則外證。一是明嘉靖時史家王圻在所著《稗史匯編》中講到《水滸傳》：

《水滸傳》從空中放出許多罡煞，又從夢裏收拾一場怪誕；其與王實甫《西廂記》始以蒲東選會，終以草橋揚靈，是二夢語，殆同機局。（見卷一百三「文史門·雜書類·院本」條）

爲甚麼說王圻這番話可證明《水滸傳》七十回後的部分是續加的呢？百回本或百廿回本的末尾不正有徽宗遊梁山泊的夢嗎？羅先生認爲徽宗的夢與《西廂記》的夢不相像，一定不是王圻所讀到的原本《水滸傳》的夢，而是續加者的創作；他認爲原本的夢當是七十回大聚義後做的。羅先生的話未嘗沒道理，但一般讀者或學者會覺得難以完全信服，因爲在一方面，王圻所指的夢爲甚麼決不可能是徽宗的梁山夢？另一方面，在七十回大聚義後，除了貫華堂本有個噩夢——這是學界公認爲金聖歎的僞作——之外，別的一切版本的《水滸傳》和其他水滸文學作品都沒有噩夢。羅先生因此在他的《水滸傳原本》最末一回也只好以「缺驚惡夢半回」結束。

第八章另一外證是明代戲曲家徐復祚《三家村老委談》的「宋江」條。這條是以答客問的形式講《水滸傳》與歷史事實的出入，諸如說宋江弟兄卅六人是正史所載，一百八人卻是小說而已；宋江吏職與殺惜可能有其事，梁山泊有其地，但仗義疏財則是誘惑貧民之語，等等。問到征遼與征方臘，徐復祚說歷史只有宋金夾攻遼；至於平方臘則係實有，但非宋江之功。這條接著有這幾句：

「然則《水滸》謬乎？」曰：「征遼、征臘，後人增入，不盡君美〔徐氏以爲《水滸》是施君美作〕筆也。即君美之傳《水滸》，意欲供人說唱，聳人觀聽也，原非欲傳信作也。」

羅爾綱先生覺得這裏的「征遼、征臘，後人增入」兩句是極有力的證據，他相信徐復祚曾看過羅貫中的七十回原本，這兩句話表示徐氏是認爲百回本的後部是後人續加的。但羅先生可能稍爲有點推論過遠，因爲無論爲何，徐復祚究竟並沒有說他曾讀過七十回的原本或者《水滸傳》只到大聚義爲止。徐氏在這裏討論的是《水滸》故事與歷史的出入，那兩句話「征遼、征臘，後人增入」與前面的討論無甚關連，大概只是他的揣測。這只足證明這種揣測是明代便已有，未足證明明人看過比百回本少了征遼、征臘，尤其是少了宋江弟兄之死與徽宗之夢的原本。

第九章羅先生提出最後一項證據。羅先生在這裏拿羅貫中的《三遂平妖傳》與《水滸傳》對勘，發覺《平妖傳》的贊詞十三篇，原樣或稍作更改後，給放進《水滸》的十五處，而這十五處都在前七十回（七十回後也有一處，但羅先生說那是續加者所爲）。前七十回與《平妖傳》還有幾處敘事情節近似，羅先生沒有做詳盡的對勘，也沒有肯定七十回後無近似情節。羅先生據此判斷前七十回是羅貫中作，以後的則不是。羅先生這判斷可能正確，也可

能不。羅先生的重點在贊詞，贊詞與文體有關，前面衆好漢的個人故事是多贊詞的，後面大夥征戰的贊詞就少了。

但羅先生的對勘卻提出了一個通俗文學的歷史課題，那就是小說中贊詞的本質。五十年代中國大陸曾有召集說書評彈藝人開會研究說唱文學的傳統藝術，發覺藝人承傳的技巧中，開場、收場和出入話題的言詞都是要項。⁴贊詞在歷史上會不會有類似的性質呢？羅先生指出《平妖傳》和《水滸》雷同的贊詞，第一種可能是羅貫中以作者身分放進兩書中，第二種可能是書賈聘用的同一編訂人寫了放進兩書中，第三種可能是編訂人從一些共用的贊詞中選出錄進兩書中。無論爲何，這是個值得探究的有趣題目。

水滸研究的新階段

羅爾綱先生的學問是最適宜領導水滸研究進入一個新階段的。水滸文學的研究，第一個階段大概是本世紀開頭的四十年，這時的領導人物是胡適和鄭振鐸。研究的成績，除了胡、鄭二氏的著作外，可以拿何心(陸澹安)的名著《水滸研究》或者鄭振鐸、王利器、吳曉鈴的匯校本《水滸全傳》爲代表。這一代的研究，讓學術界知道《水滸傳》這本小說在金聖歎貫華堂本之前原本有各種較長的「繁本」和「簡本」，從元朝下來舞臺上一直都有水滸戲曲演出，而近似今本的長篇小說在明朝面世之前已有許多水滸故事於宋元時在各地流行等等。

第二個階段始於余嘉錫先生的《宋江卅六人考實》。余先生拿徐夢莘的《三朝北盟會編》、李心傳的《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及其他宋代史籍來檢查《水滸傳》，發現小說中許多人物的名字和故事情節與靖康前後的人物吻合，顯示《水滸傳》所包藏的史實遠過於《宋史》裏侯蒙和張叔夜等傳記中的幾句話。稍後的學者有了余氏所提供的資料，不久就看出水滸故事的創造與宋金戰爭大有關係。這種共同的新見識，可在1957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水滸研究論文集》裏王利器、張政烺等人的文章中看到。

第二個階段研究的結果不如第一個階段的廣爲人知，因爲這小說被牽進文化大革命前後的政治鬥爭中去了。如果學者的探索沒有中斷，余嘉錫提供的線索，應能讓我們對《水滸傳》本身以及水滸文學演變的了解深入得多。譬如《水滸傳》中曾頭市的曾家府是金人，所以這應當是個影射性質的虛構故事。晁蓋以梁山泊先主的身分死在這裏，也就是有寓意的了。晁蓋在宋人龔開的《三十六人象贊》中並沒有早死，也沒有先主的地位；在《宣和遺事》中就成了早死的先主，但不知死在何處；在元代水滸劇中都不出場，而由宋江說出他陣亡於祝家莊。這些都讓我們朦朧地看見在水滸文學的演化過程中，影射宋欽宗的一個被敵人殺害的領袖形象一步步出現。在《水滸傳》中他的死地曾頭市固然說出了是個金人地

4 十分抱歉，我在這裏提不出文獻資料。這種資料今天在臺灣還是很難找到的。

方，在元劇的故事裏，他的死地祝家莊也可能是暗指金國，因為這個莊園是有幾個兇猛兒子的，就像金國那些太子們。又如大名府的兵馬都監李成，他的名字、綽號、武器都與金人鷹犬李成相同，不能是三重巧合；《金史》中與李成同卷的徐文，綽號「徐大刀」，當是小說中大名府的另一個兵馬都監「聞(文)大刀」。《金史》記這兩人如何在與宋軍戰鬥之外又屢次對付梁小哥等叫做「忠義人」的抗金民軍，這大概是他們被寫進小說的原因，也說明了為甚麼圍攻大名府時梁山英雄預先分派人手去殺害他們兩人的家小。大名府的梁中書又該是誰呢？他該是劉豫，因為在張邦昌退位後，金人立他為傀儡，初時定都大名府，《水滸傳》是把這個「兒皇帝」變成了「婿中書」而已。生辰綱又是甚麼呢？這一年一度的生日禮物，當是指劉豫給金人的歲貢。《宣和遺事》裏已有生辰綱故事，劫掠的英雄中有燕青，這燕青當是岳飛的忠義統制梁青(梁小哥)，《金陀粹編》裏有證據說他在梁山泊附近劫了金人的金帛綱和馬綱。⁵大名府的故事從生辰綱到後來被梁山好漢攻陷，前後有許多回；晁蓋陣亡和攻陷曾頭市的故事，或者更加上祝家莊的故事，也有許多回；單獨這幾個故事已佔了《水滸傳》中好大的一部分了。可見宋金戰事為水滸文學提供了多少的題材，對《水滸》文學的創作又產生了多大的動力。

但我們仍在等候一個新階段的研究，以解答第二階段研究所引出而尚未回答的問題，這主要是流傳與繼承的問題。宋江弟兄的故事在南宋初誕生之後，無論最初的創作者是甚麼身分，後來這些故事一定在法外強徒中間流傳過，否則便無法解釋何以這些故事會充滿亡命漢子的心態，諸如強調結義，猜疑或敵視女性，不諱言殺戮和搶掠等等。以敵視女性的態度為例，夏志清解釋為反映出中國民族性中的一點瑕疵，⁶那是看得太淺了，因為包括各國的黑社會和游擊隊在內的法外強徒組織，都對女性有或多或少的不信任。明清兩朝的盜賊流寇是傳講《三國》和《水滸》故事的，他們襲用這些故事中人物的綽號，也採用故事中的戰術和組織，這是我們已知道的。我們或者以為他們的宋江弟兄故事和劉關張故事來自《水滸傳》和《三國演義》，其實未必，民間武裝和秘密會黨可能另有他們自己流傳的故事。明清時如此，宋元時或許亦如此：羅貫中可能是從與他一般「有志圖王」的強徒羣中得到《水滸》和《三國》的系列故事，再加以整理而寫出他的兩本長篇。如果能知道宋元時傳講宋江故事的民間武裝的情形，再回過來看《水滸》，當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比如他們的組織是怎樣的，與甚麼宗教有關係——因此《水滸傳》中有那些宗教偏見。

羅爾綱先生以他過去研究太平天國和天地會等會黨的輝煌成就，自然是最有資格領導這研究工作的。

5 參看拙著《水滸傳的來歷與藝術》第二部分《燕青與盧俊義》章。

6 見夏志清《中國古典小說》(C. T. Hsia, *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New York and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8)中論《水滸傳》的一章。

Luo's Restoration of the *Shuihu Zhuan*

(A Summary)

Sun Shu-yue

The book under review, Professor Luo Ergang's *Shuihu zhuan yuanben* (Guiyang: Guizhou renmin chubanshe, 1989), is an attempt to restore the historical romance *Shuihu zhuan* to its original state as first written by Luo Guanzhong. In the Preface and Introduction that total some 90 pages, Professor Luo argues that in the earliest edition extant of the romance, i.e., the 100-chapter edition known as *Zhongyi Shuihu zhuan*, the first 70 chapters contain what survives of Luo's work, while the last 30 represent a continuation by another hand, composed about a century later. Professor Luo bases his conviction upon two main grounds: first, the beginning 70 chapters are artistically too superior to have been done by the same person that penned the last 30; and second, the 70 chapters reveal an attitude towards the down-trodden peasantry and their oppressing feudal lords which is diametrically opposite to that evident in the last 30. Thus Professor Luo is seen to be in some agreement with Jin Shengtan of the early Qing, who truncated the romance at the same chapter on similar grounds of artistic achievement and political sympathies. The Introduction also examines an impressive array of facts and testimonies from notebooks and other documents which Professor Luo interprets as pointing to the same direction as his conjecture. To reconstruct the original *Shuihu zhuan*, Professor Luo makes the first 70 chapters of the 100-chapter *Zhongyi Shuihu zhuan* his basis, but checks them against the corresponding chapters in the later 120-chapter *Zhongyi Shuihu chuanzhuan* (which he believes to have recovered some of the poems and prose passages discarded by the redactor of the 100-chapter edition), and, by picking and choosing, collects what he feels to be Luo Guanzhong's own words, always mindful of using literary excellence and socio-political attitude as his guiding principle. He performs no major operations upon the romance, not to mention overhauling its basic structure; apart from excising a few passages and making or restoring a *yinshou* (i.e., an introductory story) from the first chapter, he confines himself to pointing out in footnotes the suspicious places where the redactor might have tampered with the original text.

Professor Luo, a nonagenarian authority on the Taiping Rebellion who also dwarfs other scholars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commands attention when he has a pronouncement to make, not the least one on vernacular story-cycles like *Shuihu* and *Sanguo*, which historically were intertwined with the armed activities of the nation's lower strata. Having read the book with genuine admiration, this reviewer nonetheless feels some uneasiness and makes bold to think that maybe the facts and testimonies cited by Professor Luo as evidence could lend themselves to other interpretations as well. Above all, the division of the romance into two works by two authors at the seventieth Chapter, a legacy of Jin Shengtan, is hardly warranted by either literary or political considerations.

The article concludes with a review of the development of *Shuihu* scholarship. It forecasts that a new stage will soon be reached when scholarly investigation will be

concentrated upon the delivery and evolution of the story-cycle through subversive groups and underground forces in the past centuries, and the study of historical secret societies under Professor Luo's leadership, I am sure, will prove to be of paramount importance.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